

胡政之与_大公报_

作者：有故事的人 来源：范文网 www.wtabcd.cn/fanwen/

本文原地址：<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249422741698.html>

范文网，为你加油喝彩！

2023年12月14日发(作者：主要先进事迹怎么写)

-

不 争 柔之胜刚 弱之胜强

胡政之与《大公报》

冯晓蔚

胡霖，字政之，1889 年出生，解总编辑。胡从此不再做官，以办报放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为业。在易手之前，《大公报》是清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 1902 年 王朝帝党的机关报，在盘售之后，6 月 17 日在天津创刊，到 1949 年上就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了。胡政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 47 之在王郅隆接办后的《大公报》中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工作了 3 年，由于安福系亲日卖国，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声名狼藉，他也没有做出成绩。后编辑，历时共 27 年。来他不想再办这种机关报了。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 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由于参加了对德宣战，中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国也算“战胜国”。从 1919 年 1 月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8 日到 6 月 28 日，战胜国在巴黎举 1906 年胡政之只有 17 岁就自费到

行和平会议。胡政之受王揖唐的
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1 年回国，
委托，以《大公报》记者的身分前往
当过翻译、律师、法官、编辑、教员
欧洲，采访了这次会议。他不仅是
等，时间都不长。1915 年王揖唐任
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
吉林巡按使（即省长），胡任王的秘
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事
书。次年王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
件。在他之前到欧洲去采访的大
总长（即部长），胡在该部任参事。
概只有瞿秋白和戈公振。在中国
《大公报》原为满族人英敛之
报业史中，可以说他是采访国际新
所创办。英敛之反对慈禧，拥护光
闻的先驱。这种以总编辑的身分
绪，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办
亲自外出采访的作风，他在此后 30
报就是为了制造舆论以达到这个
年中也没有改变。
目的。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
他便无意继续经营，早已委托别人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
代管。1916 年 9 月，他把《大公报》

胡政之出国去采访巴黎和会，盘售给安福系的王郅隆接办。经
《大公报》仍由王郅隆经营。王本

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任经理兼
来是个粮商，在冶游时与安福系军

24

2014 年第 2 期

阀拉上关系，成为安福俱乐部的会
计主任。他没有办报的经验，聘请
的编辑又不得力，言论亲日，不得
人心，使这张报每况愈下。直皖战
争之后，他去日本，1923 年 9 月因地
震死于大阪，报社由他儿子王景杭
接管。随着安福系的没落，这张报
苟延残喘，无人问津，最后每天只
印几十份，在街上贴贴报牌子。1925 年 11 月 27 日终于停刊。

这时，吴鼎昌已经成为北方财阀，很久没有做官，想办一张报纸作为政治资本，重登仕途。胡政之在 1920 年回国后，没有回到《大公报》，在北京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

日报》担任了总编辑，后又到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出资经营的国闻通讯社工作，后任通讯社创办的《国闻周报》总编辑。当时，胡政之为国闻社办事常到天津，看到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关门妇女、儿童等周刊，约请社外的专这样，《大公报》在原来的废墟上又垒起了新的建筑。

新记公司 1926 年续办《大公

还在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对象是

北洋军阀。吴鼎昌、胡政之、张季

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前半

家编辑，以满足各类读者的要求。

报》不免

在续刊之初，每天的发行额只

鸾过去和北洋军阀都有联系，吴鼎昌是

有两千份，广告也不多，入不敷出，

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了，便想，能不能办一张没有背景

的报纸呢？他没有阶级观点，但是

他把“官”和“民”分开来看。张季

鸾也是老报人，办报多次都失败

了，这时正在天津赋闲，也想卷土

重来。这3个人过去都相识，因而

商量组织新记公司盘接《大公报》。

新报社是吴鼎昌的资本，胡

政之的组织和张季鸾的文章相结

合的产物。按照各自具备的条件，

由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担任经

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担任总编辑

兼副经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于是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便出版

了。

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

日续刊，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

别致，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国闻社已有北京、上海、汉口、沈

阳、哈尔滨5个分社，新闻来源比较

全面。当时国民党的中央社还没

有成立，要闻版全部都是专电。编排的形式也有突破。当时报纸是竖排的。要闻版头条由一般三栏高扩大到六栏，相当于横排的通栏。字号由老五号到一号，后来又增加了新五号和中号，大号之外再加超号，标题醒目。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都有专题报道的“特别栏”和“花边新闻”。把当时的几份报纸放在一起，《大公报》的版面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除综合性的副刊《铜锣》（后来改名《小公园》）外，还有艺术、戏剧、医学、法律、体育、每月赔钱。一年之后销数增加到六千多份，收支也可相抵。此后几年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平版机而轮转机，由每天一大张增加到四大张。1936年4月1日发行上海版，由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全国性的报纸。《大公报》出版到一万号时，有些贺词是从欧洲寄来。在三十年代之初，《大公报》的声望已经越出国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分别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抗战胜利后又有发展。1948年分别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处同时出版，销路合计每天共达20万份，超过上海《申报》（15万份）和《新闻报》（18万份），解放前在国内是最高的。这个成绩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

1941 年 5 月，美国米苏里大学

新闻学院以荣誉奖章赠给《大公报》。

在亚洲，只有《朝日新闻》

和《大公报》获得了这个荣誉。

“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人们对《大公报》

的指责，最初见于南洋华侨的

报纸上，时间大约在“九一八”之后

的一、二年。华侨爱国心切，而《大公报》

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很失望，经过相当时间的观察，恰如其分地

指出它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

忙”。由于这句话概括得很准确，因而广为流传。

盐业银行总经理，北方的财阀，对

于行将来临的“赤化”当然不能容

忍，曾有反蒋的言论。到 1927 年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资产阶级对他的看法自然也就

跟着改变。按道理讲，《大公报》

就不会再骂蒋介石了，可是事实又

不尽然。1927 年 12 月 1 日，蒋介石

和宋美龄结婚，目的是想借这条裙

带关系，提高他的声望，更重要的

是向美国靠近一步。当时他曾说

过结婚之后更有利于革命的话。

转天《大公报》的社评题为《蒋介石

之人生观》，文中有这样的话：“累

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

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

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

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这种骂蒋的文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是张季鸾写的，胡政之对蒋更有反感。

旧《大公报》给蒋介石“大帮忙”的事太多了，下面也举一个例。据徐铸成的回忆：“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

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卒开动战端。了解日本的实力，认为中国还没有编辑的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新闻工作者，可谓群星灿烂。如：范长江、孟秋江、徐盈、萧乾等等，没有哪一家工作，伯珍没有回社。还有体育编辑杨君如，原在南中毕业，大约是1932年又去上南大。

胡政之对驻外记者的培养也

„„他们3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

报社培养出这么多的名记者。这

所“学校”的“校民”就是胡政之。是不遗余力的。《大公报》的“驻国准备好，不能马上应战。张季鸾说：“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这可以说是《大公报》的“缓抗论”。

但是“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用来镇压人民，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制订了不抵抗政策，借口需要准备，压制立即抗战的主张，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

这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缓抗论”。

他为了宣传这一反动谬论，通过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求《大公报》支援，当然一拍即合。这两种

“缓抗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表

现在报纸上却并无二致。当时群众抗敌的情绪高昂，对于这种言论极为愤慨，认为这是对蒋介石的“大帮忙”。1931年底，天津有人向《大公报》社后门的效康里投了一枚炸弹；外埠的读者也寄给张季鸾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南洋华侨指摘《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也就在此后不久，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事》的社论，对“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这的确说中了问题的本质。

大力培养新闻人才

旧《大公报》不仅是一家报馆，也是一所“新闻学校”。从采访和这些人并不是在成名之后才到《大公报》的，而是到了《大公报》之后才出的名。当然不能低估他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千里马”，胡政之便是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

胡政之不但善于发现人才，还十分重视培养干部，任何人到了《大公报》的编辑部，在胡政之的安排之下，只要积极肯干，都能发出声光，绝不会默默无闻。有些人是由于向《大公报》投稿，被胡政之发现约来报社工作的。1943年前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制革系有一位学生，经常给《本市附刊》写稿，署名“力工”，后来就到报社来了。他就是杜文思。

有些同事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胡政之的接济，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马季廉等。范、徐都名震一时，无须介绍。马名全鳌，清华大学毕业。到报社之后当过国际版的编辑，翻译并由《大公报》出版《远东之危机》一书，原著者是史汀生(Henry L. Stimson)，1929年-193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还有一些学历较浅的人，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胡政之也大力支持，属于这一类的有吴砚农、郝伯珍，他们都是1928年9月考进《大公报》的练习生，担任过外勤记者，约在1931年一起到河北法商学院上学。砚农回社之后曾参加《国闻周报》的编辑

外特派员”是有十多位，如吕碧城（女）、陈学昭（女），从来没有到报社来过，她们寄来的稿子也有发表的机会。更多的人是曾在《大公报》工作过，后来弄到助学金到国外去留学（大部分是美国），愿意给报社写稿，胡政之便给他们“记者”的名义，每月给若干津贴，使他们有活动的可能，也减少生活上的困难。有些人写得较多较好，也有些人写得很少很差，报社也没有同他们计较。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可以说是胡政之对青年人的培养，至少也是互利。其中最突出的是记者兼作家萧乾。1939年夏天萧乾在香港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的来信，经该系于道泉的推荐，约他担任讲师，待遇是年薪250镑，旅费自备，先订合同一年。这样的待遇，缴了所得税只够吃饭。如果借了旅费前去，也很难偿还，他决定复信辞谢，被胡政之知道了。胡看到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肢解了捷克之后，欧洲一定会打起来，要先下一着棋子在那里，因而劝告萧乾接受聘书，旅费由报社支付，将来写点通讯相抵。这已足能表明胡政之既为报社着想，也给萧

乾以大力支援。不料萧乾领到这
笔旅费，当晚就被窃贼偷去，萧乾
大伤脑筋，胡政之却毫不动摇，他
反而安慰萧乾说：“好事总是多磨
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再
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
通讯就都有啦。”新闻记者不能守
《（

株待兔，要有科学的预见，未雨而
绸缪，在重大事变之前就能看到未
来的发展，胡政之在这方面确有过
人之处。

胡政之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记
好像由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一
样，既有留辫子的辜鸿铭，也有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胡政之也实
行兼容并蓄。从政治上来说，他既
党三中全会开幕。这次会主要讨
论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重大问题。

我以为时机重要，全力争取《大公
报》总经理胡政之敢于发表我从延

不排斥坏人，也能容纳好人。同样，安归来的报道，并且要能顶着国民
者和编辑呢？简单地说是信任
和放手。他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
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
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
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

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噜苏。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用人和选稿

尽管胡政之说“不参加实际政治”，但是他又很重视“代表国民说话”。这个思想不仅限于社评，反映客观形势的新闻、通讯以及文艺等也都有所表现。这些是读者要看的材料。

那么由谁去采访新闻、撰写通讯？采访什么新闻和撰写什么通讯？这就涉及“用人”和“选稿”。这样的问题是由胡政之决定的。自1926年新记公司成立，报社用人行政之权就掌握在胡政之的手里，编辑部各版的工作也是由他全面照顾。他曾对我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这就是胡政之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换句话说，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

用。他从来不低估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因为各有各的用处。

在选稿方面也是如此。《大公报》上刊登的反动的稿子是很多，但是胡政之考虑到读者的胃口，进步的稿子也一样刊登。

以上是胡政之“用人”的情况，下面再谈“选稿”。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同时向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和《大公报》投稿。胡政之首先发现了长江是个人才，由驻平办事处的杨士焯通知他，以后专给《大公报》写稿，每月给固定稿费15元。1935年下半年，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开始了西北的旅行。由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些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江便蜚声于新闻界。这是长江的远见卓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的作用。长江到达延安后的情况，据他自己说：“我当时曾经考虑长期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准备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毛泽东主席却指示我，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

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他希望我能立即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

“于是我立即离延安，经西安回上海，于1939年2月14日到上海。次日，即2月15日，中国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能基本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出来。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占特号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经过反复动摇，终于下了决心，要我立即写稿。同时顶着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新闻检查所反对，把我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2月15日的报上发表了。”

毛泽东主席希望于范长江的，他都做到了；范长江希望于胡政之的，他也都做到了。写稿的是长江，而承担责任的是胡政之，如果他不肯承担触怒蒋介石的风险，如果他不肯承担“抗检”的风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不能及时地向全国宣传。即使这是从“生意经”出发，在这紧要关头也是很可取的。长江

又接着说：“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大增。15日下午，报纸到了南京，和蒋介石上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根本不同。蒋介石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骂了一顿，说不应当让我乱发表文章。”长江的这篇通信，本来还有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四项保证，在上海版发表时被检扣。但同日（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天津版不但发表了这篇通信，也透露了这四项保证。《中国的西北角》发表之后又集印成书，在1936年-1937年连印7版。这是长江的卓越贡献，而胡政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抹煞。

《

去伪国大报到前后替他们加上一句：“天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除在上海购买了地皮，准备兴建新址外，并的香港版。这都表明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伪装和平，1945年假意邀请毛泽东等到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一度准备在广州出版，取代计划中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重庆谈判。事后发表了会谈纪要，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除国共两方之外，还有所谓“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胡政之也是其中之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签订了《停战协定》。

以上这些，都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到了7月，他经美帝国主义协助，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便公开破坏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10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张家口，蒋介石冲昏了头脑，下令召开伪国大，以便选举“总统”和制订“宪法”。青年党和民社党要参加，民盟宣布不参加。“社会贤达”则很动摇。这个时期的情况，周恩来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中有所说明：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

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3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又

了政协，被人唾弃。

胡政之面对着老问题：一方面要保住《大公报》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要影响销路。他所受到的压力比其他“贤达”要大：拿了官价外汇不能不买他的账。这时，蒋介石又对他进行了直接的威胁。《旧大公报》一文记载：“据胡政之对人

说，在伪国大开幕的前夕，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他，到时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蒋介石满脸怒气，一语不发。傅斯年却发话了：政之先生！你究竟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

蒋介石在发怒时是阴森可怖的。在他“满脸怒气”迫使胡政之

签名时，也就可想而知了。胡本来就七上八下，在这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加上傅斯年的挑拨，胡政之被吓倒，便跑到所谓“国大”去签名报到了。签了“胡霖”两字，铸成了大错。他也怕人给他照像，在出席11月15日“国大”的开幕式后，便由南京回了上海，再也没有去开会。他之所以去报到，归根结蒂还是由于看不到蒋政权的腐朽和人民的力量，以为国民党的天下还可以维持下去，因而他发展《大公报》的计划照常进行。

早在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之后，胡政之征得吴鼎昌的同意，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重庆、桂林、香港三馆实行“集体领导”。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两版先后复刊，胡政之撤销了办事处，成立了所谓“国大”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平均每个月消灭七、八个旅的速度，把蒋介石推向覆灭的道路。从1947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的学生、工人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野蛮镇压的办法。5月25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沪版），被国民党政府下令“永远停

刊”。《大公报》（天津版）的专电也

被检扣，胡政之雄心勃勃的计划，势将落空，心情十分低落。这时，他又接到重庆版的电报，说有 7 位

记者被国民党的特务逮捕。他对

这几位记者不太熟悉，虽然很不耐

烦，还是设法进行营救。

1948 年 4 月，伪国大选举蒋介

石为“总统”，他虽然粉墨登场，但是

灭亡的命运已经决定。胡政之看到

国民党已不可恃，他又不知道共产

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害怕因为参加

了伪国大将不见谅于人民，因而亲

自去恢复香港版。在美国订购的机

器，于 1947 年运到上海，因为没有厂

房，存在仓库里没有使用。这时因

为资金短缺，他就把机器运往香港

变卖，充作复刊的经费。

香港版于 1948 年 3 月 15 日复

刊，实现了四版同时发行的计划。但工作并不顺利，耗资费劲，因而

使他操劳过度，4 月 24 日正在工作

时，肝硬化病暴发，27 日他回到上

海治疗。于 1949 年 4 月 12 日去世。



更多 在线阅览 请访问 https://www.wtabcd.cn/zhishi/list/91_0.html

文章生成doc功能，由[范文网](#)开发